

乌克兰的改革

过渡时期的 宏观经济

GUODU SHIJI DE HONGGUAN JINGJI

[乌]米·安·帕夫洛夫斯基 / 著

何宏江 等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 ——乌克兰的改革

[乌克兰]米·安·帕夫洛夫斯基 著

翻译：何宏江 任建华 赵永穆
邢艳琦 李文厚 施用勤
张以童 赵国顺 赵晶旸

统稿：何宏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乌克兰的改革/[乌克兰]帕夫洛夫斯基著;何宏江等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8

ISBN 7-80112-440-5

I. 过… II. ①帕…②何…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乌克兰
IV. F15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6973 号

责任编辑 齐长虹

封面设计 田 昀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6552 3123 6552 3819

社 址 北京市工体南路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印 刷 长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12-440-5/F·146

定 价 22.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由乌克兰全国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推荐出版

评审:乌克兰全国科学院 Ю. Н. 帕霍莫夫院士和 Н. Г. 丘马琴科院士,乌克兰全国科学院 Л. К. 别夏斯内通讯院士、经济学副博士 В. М. 叶姆琴科

米·安·帕夫洛夫斯基

《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乌克兰的改革)》基辅,技术出版社,1999年,共366页。

ISBN 966 - 575 - 057 - 7

本专著根据对乌克兰持续危机的后果及其主要成因、过渡时期经济特点的分析,考虑到地理经济的问题以及民族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论证改变改革方针的必要性、国际金融组织的建议及与其合作的条件的反科学性。在考虑世界经验的同时,提出了乌克兰能藉以摆脱危机、经济开始稳定增长的经济理论。书中列出经济理论特别是通货膨胀理论中大量新的学术观点。向在公理基础上建立起宏观经济学迈出了一步,引入了经济体系稳定性的概念,因此能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国际金融危机发展的实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过渡时期国内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法律草案,这些法律草案实质上形成了乌克兰改革新方针的框架。

本书的对象是社会政治学科和经济学科的专家以及关心国家和自己命运的读者。

序 言

后共产主义时代乌克兰社会的发展和乌克兰经济的转型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这些问题要求根据乌克兰的特点——其地理位置、科学技术潜力、自然资源、乌克兰人民的才能和勤劳——来认识经济改革的基本概念和实际步骤。

本书作者试图依据经济理论的成就来回答以下问题：改革的方针究竟选择得是否正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休克疗法”是否是乌克兰社会转型的最佳道路？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经济模式对乌克兰是否合适？而这一模式在拉丁美洲各国采用后已表明其毫无前途。是否可以从经济学观点来论证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条件和它们提供贷款条件的理由？是否还有其他的不会导致生产毁灭、乌克兰广大居民阶层贫困的社会转型途径？怎样引导乌克兰摆脱危机？为了使乌克兰从世界经济外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需要怎么办？

能达到社会和谐和一致的乌克兰改革思想和改革哲学应以什么为基础？

各政治党派在乌克兰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

作者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实质上构筑了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独特的新构想。

本书的特点是在研究宏观经济过程时考虑了以下因素：

过渡时期经济的矛盾；

改革的政治经济内容和地理经济的问题；

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古典(野蛮)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社会发展两个极端时代国家调节和市场自我调节的相互作用和比例关系；

过渡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过程的特点；

市场的基本公理、原则和规律，如此等等。

作者试图如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那样依据公理来有条不紊地阐述宏观经济的问题。

例如，本书概括了市场的基本公理、原则和规律，提出了对过渡时期经济体系、国家安全等的明确定义，引进了经济学的新概念——经济体系的稳定性。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与市场公理、原则、规律以及经济学和哲学其他普遍法则相抵触的结论和建议是破坏经济体系的或毫无经济目标的，是不科学的。

例如，作者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和建议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反科学的。

这样的方法使作者能得出宏观经济学的一系列新成果并科学地论证或批驳某些作者的许多论点和结论。

例如，作者依据其在考虑过渡经济特点后提出的通货膨胀公式表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的建议和结论有很大的局限，这一理论的数量评定在一定条件下过于粗糙或根本不适合乌克兰所特有的滞胀或恶性滞胀的条件。

作者表明，在乌克兰的条件下预算赤字与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易货贸易、生产下降程度及相互欠债程度、货币周转率等相比，在造成通货膨胀紧张状态方面是次要因素。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经济化”是米·安·帕夫洛夫斯基教授的一个特点。例如，他提出的衡量政治上左派、右派和中派的经济标准对于研究社会结构化问题、各政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很有

意义。

依据作者发挥的社会两个极端的观点,深入研究并从新的角度揭示了民族思想和国家利益在取得一致、发展民族和国家方面的作用和地位。正是民族思想造成了走向上述社会发展两个极端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哪些地方不接受民族思想,这一思想在那些地方就“不起作用”。

作者断言,民族思想是改革唯一的思想和哲学,它能引导乌克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导致广大居民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子孙后代前途辉煌。

作者指出,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成了历史。因此,口口声声要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首先应该明确认识到,什么是市场,市场从原始形式走向现代高度发达的、完善的、由国家调节的体系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

现代文明的市场关系是国家调节和市场自我调节的统一,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每一个独立国家来说都是不同的,是由各国的具体经济条件、历史和人民的心理特征所决定的。

因此以货币主义政策为基础的芝加哥学派惟一的、对所有国家都千篇一律的社会转型模式不能不令人生疑,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通过它的条件把这一模式强加给与它合作的所有国家——拉美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对“休克疗法”计划的实质和给乌克兰造成的后果的分析。作者与许多经济学著作不同,论证了他自己的结论,提出了对法律草案的建议。

本书的成果将有助于在主要经济目标(乌克兰广大居民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各个领域中国安全的保证)的基础上自觉地、有科学根据地形成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

米·安·帕夫洛夫斯基的《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乌克兰的改革)》一书无疑将引起人们的思索,号召大家对如下基本关系作科学的分析。这些基本关系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保护贸易政策,社会的开放和封闭,平等和自由,对经济的国家调节和市场自我调节,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的建议和原理,消极的和积极的预算政策,国家利益,对内和对外政策中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自由化和国家安全,政治上左派和右派的观点,精英治国主义国家和世界经济外缘地带国家的目标与方法,等等。

总之,本书作者根据发达国家的特征,科学地证论了改革新方针的原则,这一新方针能防止爆发全国性的大灾难,从危机走向经济增长,引导乌克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著名学者、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乌克兰人民代表米·安·帕夫洛夫斯基的这本书是对经济科学,特别是过渡时期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这本书无疑将引起一切关心我们主权国家的发展问题及其前途的人的巨大兴趣。

乌克兰全国科学院院士
乌克兰全国科学院经济学部秘书 I. I. 卢基诺夫
乌克兰全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变改革方针是拯救 乌克兰的惟一道路 (代引言)

在改革之初,在乌克兰独立后的头几年中,市场转型被看做是提高劳动效率的方法,是乌克兰全体居民改善生活的源泉,而不是最终目标。但这些思想逐渐被对现实失去客观认识的市场浪漫主义所排挤。通过国家财富的再分配轻而易举地大发横财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国家里造就了一支第五纵队,产生了影子经济、有组织经济犯罪和贪污受贿。根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拟订的“休克疗法”计划,开始了并加速推进为改革而进行的改革,没有经济目标的改革,违背经济学、不顾过渡经济特点的改革。牺牲国家利益的改革,对乌克兰广大居民阶层是种族灭绝开始的改革。乌克兰在实行现行改革方针时期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它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经济损失,而人员的损失达到 200 万人。

从 1990 年到 1999 年,乌克兰的国内总产值下降 74.2%。1993 年恶性通货膨胀率达 10 252%。包括隐性失业在内的失业率现已达 40%,学术界达 90%。80% 以上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 1% 的居民生活有保障。几百万有工作者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即使是极低的工资——1998 年为 69 美元,而同期俄罗斯为 150 美元,捷克为 300 美元,波兰为 308 美元,斯洛伐克为 611 美元。住房问题极为尖锐:13% 的居民没有单独的住房,260 万户家庭要求改善居住条件。在这样的工资收入条件下要购买住宅需要

工作 150 年。

乌克兰不仅没有在西方市场找到一席之地,而且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因为商店中 95% 的日用必需品和大量食物都是进口的。与此同时,我国食品工业大量剩余物品——家禽、肉、黄油等——在变质。与 1990 年相比,1998 年谷物生产下降 58%,糖和肉类生产下降 60%,牛奶生产下降 76%,牛的头数减少 53%,羊减少 80%,猪减少 71%。

人为的严重的支付危机给工业以致命的打击。“休克疗法”计划提出的榨取税收使生产部门的运行更加困难。

乌克兰出逃的资本几乎比外国对乌克兰的投资水平高出两倍。

300 多万轻信的乌克兰公民由于没有估计到“新乌克兰人的心理特征”,在建立金融中介机构——信托公司时上当受骗,被洗劫一空。

社会的实际价值被虚幻的财富——大量的外国商品偷换。发生了“货摊革命”。为私有化而进行的私有化不是也不可能是有效的,这不是由于缺少有实力的所有者,而是由于没有产业政策。

乌克兰越来越闻名于世的是它虽然拥有独立国家的地位,却没有特殊的企求,不是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可以认为它是陈旧技术、工艺和质量不高的产品的消费国。乌克兰正合经济发达国家和成功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的胃口。

改革的领导者们相信了“西方的援助”,没有注意地理经济问题,没有考虑到世界上存在两极——发达国家和作为发达国家剥削和文化扩张对象以及原料附庸的世界经济外缘国家,发达国家不愿意把后社会主义国家同自己的“亿万金元”连接在一起。

“休克疗法”计划勾销了公民的存款和企业的流动资金后,正在毁灭乌克兰的生产和智力。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乌克兰的

总统和政府如果主张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条件与它们合作,不管是否愿意,都是公然或暗中在违背广大居民阶层的利益,违背乌克兰的国家利益,违背生产的利益。

西方有着殖民化的丰富历史经验,通过打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旗号进行改革,实质上是在按金融奴役模式和促使后社会主义国家破产的疗法执行对这些国家新殖民化的政策。

同时西方自己从来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进行改革。这个模式是西方给欠发达国家开的药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总裁J. 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主义狂热鼓吹者的“忠告”表示说:“如果遵循这些忠告,那么美国就无法取得重大的经济增长。”美国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说得更激烈:“那些谈论向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市场回归的人,是精神病患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施·乔治^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持同样的看法:虽然这一模式已实施了20多年,但只对西方银行有利。

从乌克兰流出的我们的200亿美元同样给西方带来了好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各国总统和政府的关系要比各国人民同执政精英的关系好得多。

文明的发展分为全球性的几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宗法制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

宗法制社会的特点是“人—自然”的基本关系。

后工业化社会是文明按“人—人”关系公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社会所特有的发展人道化、与大自然的和谐、人的个性的张扬、人的伟大、“理性经济”,不仅是工艺劳动过程的,而且是社会文化

^① 原文疑有误,似应为乔治·施蒂格勒。——译者注

过程的基础。

20 世纪初,工业化社会中明确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两个对立的极端——国家社会主义和古典(野蛮)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进发展决定了从这两个极端走向混合经济模式的过渡时期,社会通过这一模式走向后工业化社会这一发展新阶段。前进发展的核心是发达国家,而外缘是以古典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为主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及后社会主义国家。

在 20 世纪里,发达国家建立了与古典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比较为进步的新的社会制度——精英治国主义或新资本主义。这一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自由市场模式截然不同的混合经济。同时精英治国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由于大众文化的粗俗化,霸权主义的表现,经济、生态和意识形态等形式的扩张主义而危及文明,因为这一切都违背了世界经济外缘地带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攫取“第三世界”国家市场的途径是:单方面的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提出不平等贸易交换的条件,垄断高工艺(所谓的智力工艺地租),采取促进本国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有效经济机制,严格限制进口,再加上消灭生产潜力、科技潜力、工艺潜力和教育潜力,使国家不再干预经济。

按混合经济模式进行的社会制度转型的渐进道路依据的是各种经济理论的总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由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奠定基础的乌克兰革新理论和约·凯恩斯的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国家目标明确的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国家调节和市场自我调节的合理结合之上。

乌克兰“改革”理论家们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依据各种经济理论的总和,而是完全依据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米·弗

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理论,把 20 世纪经济学最高成就——乌克兰革新理论弃之不顾。这样做是由于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接受了外国顾问的建议,同时也是“新乌克兰人”这些腐败乌克兰半奴隶心态和掠夺乌克兰人民、发横财的巨大胃口在起作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乌克兰正从 20 世纪退回到 18 世纪,接受了以利润最大化为活动主要动因的亚当·斯密和芝加哥学派模式的市场关系,把社会与生产和国家对立起来,对精神价值、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嗤之以鼻。

乌克兰具有一切必要的条件,能够在确定了以混合经济模式为改革目标之后,依靠本国的生产力,本国人民的信任、勤劳和才能,依靠各种经济理论的总和来保证本国的国家安全和广大居民阶层很高的生活水平,争取在发达国家、精英治国主义国家行列中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

而发达国家的特征是:

对经济的市场自我调节和国家调节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而不是两者的对立;

经济的多种成分,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其决定性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倾向是冲刷(“取消”)私有制和剥夺资本家,经济的主体是金融精英的权力,这就促使从私有制向公司精英所有制过渡。在发达国家中所有制是一整套权利,不仅是占有、利用和支配权;

对外经济活动单方面的自由化,同时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生产者;

在各种经济理论总和(货币主义理论、凯恩斯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的基础上发展,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由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乌克兰提出的革新理论;

本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标准)和社会保障水平;

发达的民主——在社会结构化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妥协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冲突,执政的政治精英的爱国主义以及他们对本国居民的掠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社会中有现代的中产阶级(和谐的基础),这是中产者和技能高度熟练专家——工人、学者、教师、医生、法律工作者、国家职员、创作人员等——的总和;

国家保持独立和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的可控制性;

限制外国对本国公司的投资和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土地;

利用民族思想、国家利益作为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

总之,如果改革的目标是建成能导致广大居民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符合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的市场关系的话,那么乌克兰应该改变市场改革的方针,从古典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走向精英治国主义(新资本主义)模式,即走向混合经济,使改革的内容符合乌克兰宪法。

早在1992年,奥地利科学院出版了《市场休克》一书,其中概括了“阿任达”小组有关中欧和东欧社会经济改造的材料。19个国家——美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波兰、俄罗斯、乌克兰等——的著名学者参加了这一小组。代表乌克兰参加这一小组的是乌克兰全国科学院 H. T. 丘马琴科院士。

该小组工作的基本结论反映在上述专著的前言中:“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中欧和东欧从前的中央计划经济向自由的市场体系的转变途径是错误的。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在于这种转变的最终目标,即在自由市场势力的基础上发挥经济积极性,而在于目前试验的转变计划引起人们完全不必要的痛苦,在形成有生命力的本国经济和保障居民就业率方面没有保证取得多少重大的进步……除此之外,小组成员都确信,如果不就目前事态必须导致的危险表示

不安的话,那就是毫无原则的。”^①

美国、加拿大和比利时 30 位著名学者于 1991 年给米·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中谈到土地私有化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在这些学者中有 3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弗兰科·莫迪利阿尼、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洛,他们说:“……存在着您的国家仿效西方某些特点的危险,而这些特点阻碍了这些国家达到本可能达到的高度繁荣。例如,存在着你们可能走我们的道路,允许私有经济成分掌握大部分地租的危险……社会应作出最大的努力使作为集体劳动成果的地租被用来造福于它的公民。”^②

乌克兰改革可悲的结果,尤其是 1998 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证实了西方和乌克兰许多学者的预测,他们指出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模式进行改革的思想不仅对经济增长条件,甚至对经济稳定都毫无用处。

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社会转型经济政策不仅是使生产企业破产的政策,而且还是使执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条件的国家破产的政策。

想只按市场法则经营的愿望是危险的空想,这一空想已导致人类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没有产生市场,反而产生了极权制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大众媒体对社会的活力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大众媒体的控制股票额(30%)属于西方公司。这样的大众媒体当然只捍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主义价值观,在社会

^① 扬·克列格尔,埃贡·马茨涅尔,格尔诺特·格拉别尔《供“阿任达”小组用。市场休克:“阿任达”小组有关中欧和东欧社会经济改造的材料》(译自英文),维也纳,1992 年版,第 7 页。

^② 罗纳德·贝克斯《社会福利和个人利润》(译自英文),圣彼得堡,1994 年“生态城市”科学研究中心版,第 42 页~47 页。

上散播和维护关于改革取得成功的神话。他们制造自己的英雄，选出自己杰出的年度人物。

有两个方面的神话意识。一方面是扭曲的、不适当的、不客观的、浪漫主义的关于经济规律与社会中社会经济过程相适应的看法，制订政府计划，试图藉此来引起人们乐观的期望，却没有保证实现这些期望的坚实基础——本国的生产。另一方面是顽固地硬要社会相信对“激进经济改革”后果的正面评价；往往用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概念偷换货币稳定的概念，而在生产下降、失业增加和广大居民阶层贫困化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稳定。乌克兰居民为了目前的货币稳定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越来越多的外债和积欠的未支付的工资、养老金和助学金、推给子孙后代的通货膨胀。

但不管制造什么样的神话，时代要求寻找到有科学根据的、能使乌克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途径和方法的建议。

本书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

(1)乌克兰确实有着惟一一条具体的摆脱危机的道路——改变改革方针，但要走这条道路就需要估计到自由市场的优点和缺点，地理经济的过程，世界两极——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精英治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外缘地带（乌克兰肯定已进入这一行列）——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和目标；

(2)正在执行的改革方针是走向 18 世纪市场关系和经济模式的道路。与此同时，乌克兰依靠自身的力量，自己的科学工艺成果，只要改变这一方针，尚未失去机会，可以同发达国家一起在 21 世纪里开始走向工业化的革新社会；

(3)为了使乌克兰摆脱危机，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民族思想应成为市场改革意识形态中惟一的主要思想，实现这一思想的关键是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中保护本国的利益。今天民族思想尚

“未起作用”，它被人出卖了，因为正是民族思想是走向古典(野蛮)资本主义的障碍；

(4)要实现本书提出的建议，执政精英必须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对于他们来说民族思想应高于一切，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必须围绕民族利益集中；

(5)世界经验提出了摆脱危机的各种途径，经济学拟订了相应的各种经济理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国顾问们，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同乌克兰改革的思想家们一起推荐的不是经济的发展战略，而是相反的战略——衰退战略；

(6)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以及同它们合作的条件，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反科学的。正是由于执行了它们的条件，才从本书论证的四个方面吓退了私人投资者。

从经济学角度客观地揭示出破坏乌克兰生产——它的经济体系基础——和导致丧失国家的经济独立，进而丧失国家地位的因素。

作者力图提出建议，依据的是把经济体系看做是囊括为满足人的需要、为人的生活和再生产创造必要的一切活动领域的综合体系，因为政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实现人的权利和自由创造条件，而不是唱高调。

如果说目前改革方针的目标是保护所有权和自由竞争，那么改革的新方针的目标应该像发达国家那样是保证经济增长的条件，保护人的本身，为乌克兰境内广大居民阶层过上体面的生活创造条件。

本书列举了作者提出的许多法律草案，这些法律草案决定了对内对外政策的原则、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宣布改革的新方针是走向民族和国家繁荣的道路。